



百年炉火的“铁打人生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牟方根



民间素有“世上三样苦：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”的说法，其中打铁因其劳动强度大、工作环境恶劣、技术要求高，被列为“三苦”之首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随着工业化生产的普及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，手工打铁逐渐从主流生产领域退出，如今已淡出大众视野，成为乡村记忆中的一道风景。

最终，他钳起成型的铁器，猛地扎入淬火池。“嗤——”滚烫的金属与冷水撕咬纠缠，白烟暴起间，一汪幽蓝从铁器表面倏忽闪过——千锤百炼后，顽铁终成钢。

趁着歇息的空当，老铁匠用毛巾抹了把脸，然后乐呵呵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：“我叫熊国文，今年59岁。12岁时，我就跟着父亲熊道金学打铁，这一打就是47年。从我的曾祖父熊府成那辈算起，到我的祖父熊少河、父亲熊道金，再到我——我们熊家四代人守着这家铁匠铺，叮叮当地打了一百多年的铁。咱家这铺子，称得上‘百年老字号’！”

熊国文常听长辈念叨家族往事——1914年夏，白羊镇遭遇百年大旱，河沟断流，土地龟裂，庄稼歉收。在“天旱三年，饿不死手艺人”老话的指引下，熊国文的曾祖父熊府成时年13岁，背着铺盖卷徒步四十余里到万州县城，拜一位姓李的铁匠为师。历经三载寒冬酷暑，至1917年夏秋之交，熊府成学成出师，挑着师傅赠予的工具回到白羊镇，在自家屋里生起了炉火。熊家铁匠铺，就这样世代延续了下来。

炉火不灭的匠人魂

“铁匠技艺的精髓往往不在书本上，而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之中。”熊国文说道，“从辨别铁料的成色，到掌握火候的微妙变化，再到锻造时的力道与节奏，这些技巧都需要师徒间口耳相授、手把手地指点。徒弟必须长期跟随师傅，观察他的动作，总结他的经验，聆听他的教导，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门道……”

熊国文还告诉我们，传统铁匠铺采取“一师一徒”模式，学制通常为三年，规模较大的店铺可能多带一两名师徒。

第一阶段（第一年）：学徒主要从事拉

风箱、搬运燃料等杂务，逐步接触基础锻打，熟悉火候与材料特性。

第二阶段（第二年）：系统参与粗锻，使用重型“力锤”协助师傅完成毛坯成型，师傅则用精准的“成型锤”负责修正细节。

第三阶段（第三年）：以观察精加工为主，徒弟要参与器物的最后成形，但核心工艺仍由师傅把控。

传统打铁技艺中凝结的实践经验，往往需要学徒在长期操作中领悟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与直觉判断。例如“红打铁，白打钢”，意思是铁坯烧至暗红（约800℃）即可锻打，而钢则需要更高的白热状态（约1200℃），否则易裂。这不仅是对火候的判断，更隐含着“因材施教”的哲理。再如“冷铁难成器，慢工出细活”，意思是铁一旦冷却便失去塑性，强锤易碎，而精锻阶段则需要反复回火、轻敲慢修，体现“精雕细琢”的匠人精神。

铁匠学徒出师时，师傅一般会赠送以下礼物：一把师傅用过的旧锤或定制的新锤，象征“一锤定音”的出师资格；一把淬火用的火钳，寓意“拿捏分寸”的行业精髓；一口代表“衣食饭碗”的铁锅，既实用又隐喻“匠人永不挨饿”；一件师傅穿旧的打铁罩衣，既是信物也象征“遮风挡雨”的

庇护延续；一句行话，如“不打凶器、不打伪器、不打亏心器”……徒弟要向师傅行跪拜礼，赠送谢师礼。而谢师礼离不开“三色”厚礼：鲜红猪肉（称为“谢师肉”）、陈年黄酒（称为“敬师酒”）、足尺蓝布（称为“恩师布”），表达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的敬意。

据熊国文回忆，其家族四代人（祖辈、父辈及自身）累计培养徒弟30余人。在铁匠行业兴盛时期，白羊镇内的铁匠铺多由熊家铁匠铺的徒弟开设，形成了以熊家技艺为核心的地域性行业网络……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马加鞭和机械化农具的大力普及，白羊镇铁匠铺从鼎盛时期的23家锐减至2000年仅存3家。至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（2018年）时，全镇仅剩熊国文经营的熊家铁匠铺延续传统手工锻造，主要承接农具修复和民俗铁艺定制。

“打铁这门手艺，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智慧，不能让它轻易失传。”熊国文建议，“将手工打铁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。这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抢救性保护，更是通过保护措施促进现代技术推陈出新，为工业化时代保存一份人类手工文明的原始样本。”

传承百年的铁匠世家

前些日子，我路过重庆市万州区白羊镇，偶遇一家仍在营业的铁匠铺，显得格外珍贵。白羊镇位于万州区东部，其名源于清代石刻“白羊坪”（现立于白羊镇白羊社区文化广场），是一座富有历史韵味的小镇。

一踏入铁匠铺，灼热的炉火气息便扑面而来。炉膛由一块块未经烧制的毛坯砖粗糙地垒砌而成。伴随着扶手的推拉，木制风箱发出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息声。砧座在千锤百炼下早已凹陷锃亮。淬火台表面布满锈迹与斑痕，仿佛记录着无数铁器的诞生。大锤、手锤、铁钳、磨石散落四处，每一件工具都被磨得黝黑发亮，无声诉说着经年累月的敲打与淬炼。

炉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，映照出一位老铁匠的身影。他个头不高，却筋骨结实，粗壮的臂膀上青筋盘结，仿佛每一寸肌肉都经历过铁与火的锤炼。火光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跳动，将那些刀刻般的皱纹映照得愈发深邃。待铁块烧至通红，他眼疾手快地钳起，“啪”的一声甩上砧座，随即抡起铁锤，“趁热打铁”。

“叮——当——”一锤追着一锤，沉重的锤打声在逼仄的铺子里回声嘹亮。铁块在他疾风骤雨般的锻打下延展变形，炽热的赤红随着每次锤击褪成暗沉深红。

冯玉祥在江津写“丘八诗” 呼吁整治长江险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

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可谓能文能武，他体察民情，关心民生，注重民意，写了许多通俗易懂、朴实无华、真实自然、不拘格调的诗歌，自称“丘八诗”，周恩来也幽默地称他为“丘八诗人”。冯玉祥的这些诗作，一些是宣传抗日救国的，但有四首却非常特殊，其内容是呼吁国民政府注重长江航运安全。

1944年3月5日，天还没有全亮，冯玉祥将军偕同随员从重庆乘坐“民裕轮”到江津组织开展“献金抗日”运动。当轮船行至巴县与江津交界的小南海水域时，天已大亮，此时船行很慢，只见两岸高山古木参天。这里又叫“茅公峡”，滩多水急，暗流涌动，船身簸动甚剧，随行的江津地方官员告诉他，这里经常发生客船翻沉事故，死人很多。冯玉祥将军听后非常伤感，他觉得应该立即治理此处的暗礁。于是，在船上他写了一首名为《小南海》的“丘八诗”：“小南海，在江心，船破淹死很多人。革命为除人民害，到此险滩最要紧。三万大军携工具，开凿山石水平稳，真正为民谋福利，实行主义之根本。”

3月6日，冯玉祥由江津县城渡船过长江，准备到德感坝的国立九中本部和武昌艺专两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。渡船行驶到江心的时候，一条火轮船驶过，激起了很大的波浪，渡船左右摇摆不止，非常危险。同船的江津县长肖振宇（肖烈）告诉他，前不久

一艘“民生”客轮停靠在码头的时候，上船的人多，宪兵不准开船，耽误了约1个小时，后经担保才开船，船员怕误时，开足马力，不想在江心与一艘民船相撞，淹死了20多人。其中国立九中的学生5人落水，2人死亡。冯玉祥想，把老百姓的生死看得太轻了，认为死了几个无知的老百姓算不了什么，这还算是国民的政府吗？既是国民政府，就应该处处为国民的安全着想，不能草菅人命。于是，他怒笔写下又一首“丘八诗”《轮船》：“民生轮船载客多，公家不准就开舵。说话耽误一点钟，担保无事方开脱。舵工惟怕船到晚，马力开足江心过。大浪撞翻一民船，淹死民众二十多。九中学生亦落水，两个死了三个活。耳朵听了心难过，人不当人是谁错。”

“武昌艺专”是从湖北迁来的一所艺术大学，校址在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李氏宗祠内。校长唐义精和任教务长的五弟唐一禾都是当代有名的画家、教育家。他俩于1944年3月23日乘“民惠轮”赴重庆准备参加全国美术协会会议，超载的客船在小南海触礁翻沉，唐氏兄弟双双溺水而殁。其时唐义精52岁，唐一禾仅39岁。噩耗传来，武昌艺专的师生们在长江两岸奔走哀号，呼唤着他们的校长和老师。冯玉祥将军得知此消息痛心疾首，他以泪和墨，挥毫写下了《武昌艺专》和《民惠轮》二首“丘八诗”。这两首直白而情真意切的诗作，不仅



1944年3月，冯玉祥将军在江津县白沙镇合影。

表达了冯玉祥将军对遇难者的哀悼，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要唤起民众注意安全、呼吁政府当局关注水上安全的决心。冯玉祥将军曾二次发电报给国民政府政务院和水会，提出在长江上治滩治水的方案，以保民众的安全。

《武昌艺专》：“献金来到江津县，武昌艺专在对崖。地方虽简陋，师生能苦干。最好贤校长，真是英雄汉。其弟曾留法，艺术高云汉。内外都洁净，山野梨花都开遍。谁知两位好人才，不久南海翻了船。翻了船，把人淹，国家损失无法言，人人提起泪涟涟。”

《民惠轮》：“我过小南海，看着形势坏。江水俞浅少，船须靠北歪。水反流很急，最

易出灾害。曾发两电报，政院和水会。内言民命重，打滩把民爱。不料几十天，船翻遭大灾。死者四百几，许多好人才。痛心最痛心，眼泪湿我怀。两位唐先生，外国学回来。谁想出大祸，哀哉真哀哉。”

船舶客运是当时中国运输业的大项。当年铁路和公路没有延展至山乡，船舶就是最好最便捷交通工具。有山就有路，有河就有渡。然而，航运安全实为重中之重。在旧中国，呼吁政府注重江河安全和整治长江险滩恶水的士大夫肯定大有人在，但冯玉祥作为一名将军，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，用写“丘八诗”这种特殊方式进行呼吁，算是“文谏”，为之罕有，这是难能可贵。